

中共的世界戰略

姚孟軒

中共的世界戰略，在過去二十九年間曾有三次改變。一九四九年六月，北平政權成立前夕，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①。這包括：以美國為假想敵，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把「國家安全」依託於莫斯科的保護；參加由蘇俄為家長的共產國家大家庭，對外行動遵循這個大家庭的統一路線，以反帝為共同目標^②；內政方面「走俄國人的路」，仿倣史大林模式、依賴莫斯科援助建設自己的「國家」。

毛澤東以「一邊倒」外加上幾個不平等條約^③，才換得史大林三億美元的援助。而美國當時有意以建交和援助，換取中共的狄托化^④。如果轉向華盛頓謀取友誼，則只要疏遠莫斯科，不必倒向任何強國，也不必犧牲任何權益，就可以獲得可能遠較蘇俄為多的美援。純就「國家利益」考量，毛不應該選擇向蘇聯「一邊倒」。有人以為毛這樣做是基於安全考慮，但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既然能支援狄托消解史大林的軍事威脅，也必能給狄托化的中共同樣有效支援，毛不是為了「國家安全」反美親蘇，他作此抉擇，顯然另有原因。

毛澤東師承列寧、史大林的世界觀，將整個世界劃分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兩個敵對陣營；北平政權是個共產政權，自應站在共產陣營一邊。而在那個時候，共產世界是史大林的世界，中共又是從莫斯科移植到中國來，奉史大林主義為黨的思想基礎與行動指南，並依賴蘇聯的援助奪得政權，早已建立對克里姆林宮的深厚依存關係；北平政權所需要安全保障、經濟及其他援助，在共

註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一九六〇年北平第一版，一四七七——一四七八頁。

註②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報社論：「中國人民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中共政協「共同綱領」第十一條——香港大公書局一九五〇年人民年鑑，三六頁。

註③ 這幾個不平等條約是：與蘇聯共同管理中長鐵路、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及大連港、共同開採邊疆有色金屬與稀有金屬、共同經營民用航空事業。這幾個條約，除了中長鐵路管理權，史大林在一九五二年就移交中共，其餘都是黑魯曉夫掌權後才廢除。

註④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毛選第四卷一四九九及一五〇〇頁。

產陣營內，也只有從莫斯科才能獲得。因之，毛澤東除了表示屈服，以「一邊倒」博取史大林的歡心，實別無選擇。

莫斯科規定，北平在共產國家大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是充當「幫助」殖民地及附屬國「與帝國主義鬥爭的忠實朋友和可靠堡壘」^⑤，中共則自封為共產陣營「在東方的支柱」^⑥。然而，不論是「堡壘」還是「支柱」，在這個時期，中共的對外活動，都在執行史大林世界革命戰略中的亞洲擴張計劃，從結盟到史大林死去這三年多時間，曾為此採取兩項重要行動。其一是在北平設立遠東共黨情報局^⑦，向東南亞國家輸出毛式暴力革命。在北平成立遠東共黨聯絡中心，乃莫斯科所決定^⑧，但中共認定這一地區共黨革命必須依循毛澤東路線，並應由北平負責指揮，則非史大林所能接受^⑨，一九五一至五二年間，中共向印度和印尼共黨推銷毛路線，更遭受史大林的「堅決反對」^⑩。

中共採取的另一項重要行動是參加韓戰。毛澤東後來透露：史大林曾懷疑他會變成狄托，中共介入韓戰後，才相信他不致如此轉變^⑪，北平與莫斯科的同盟關係，也因而有所增強。而另一方面，韓戰刺激美國將圍堵政策由歐洲擴大至亞洲。這就在亞洲形成中共與蘇聯結盟，同美國軍事圍堵相抗衡的長期戰略對峙局面。

史大林死亡以後，毛曉東與黑魯曉夫有一段蜜月時期。黑魯曉夫清算史大林，與毛澤東發生齟齬。不過，毛認為這是扯小皮，是「十個指頭九個一致，一個不一致」，其對策也強調「求同存異」^⑫。直至「鳴放」運動激起反共潮，毛發覺中共的控制放鬆不得，因而決定擺脫蘇共的修正主義，另外謀求出路。於是從一九五八年秋季到五九年秋季這一年期間，他推行人民公社，挑起臺灣海戰爭，隨後又與印度爆發邊境武裝衝突，這三項行動，將對內對外政策拉離莫斯科的軌道。毛澤東自作主張，是基於對北平政權安危治亂的考慮。而在當時，克里姆林宮正大力宣揚黑魯曉夫主義，企圖開創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黑魯曉夫時代，自難容許毛標新

註⑤ 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共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社論：「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國的偉大勝利」。

註⑥ 周恩來在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文件」，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二二頁。

註⑦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一日在北平舉行亞澳工會代表會議，決議成立亞澳工會聯絡局，設於北平，劉少奇在開幕詞中說：毛澤東道路「可能成為情形類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解放的基本道路」——「亞洲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廣州新華書店，一九五〇年，二至八頁。

註⑧ 亞澳工會代表會議係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工聯決定召開，會中由蘇聯代表索洛維葉夫（Solovyov）提議在北平設立聯絡局。

註⑨ 蘇聯後來指控中共是「覬覦亞洲革命運動的領導權」——鮑里索夫（O. B. Bonisov）、瓦洛斯科夫（B. T. Koloskov）合著：《蘇中關係（1945—1970）》，彭士諤中譯本，九三頁。

註⑩ 同⑨九四頁。

註⑪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八月版，四三二頁。

註⑫ 毛澤東：「在省市委書記會議總結」（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澤東思想萬歲八三至八四頁。

立異，自行其是。一九五九年，毛謀奪領導權的野心也逐漸暴露¹³，這也不是黑魯曉夫所能容忍。這種基本利害與權力衝突，使兩黨關係日益惡化，黨際衝突又很快擴大到「國家關係」，迨至蘇聯切斷對中共的援助，分裂已無可避免。

史大林死去後，克里姆林宮的新主宰放鬆控制，中共對外行動有了相當自主權，但是在分手以前，仍然遵循莫斯科的世界戰略，執行兩個陣營和平共處及和平競賽的政策，並分別以西方世界兩個工業大國為競賽對象，蘇聯的口號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中共則是十五年趕上英國。在此期間，北平運用和平共處策略，在亞洲的影響力有所增進，並賴以敲開通往中東與非洲的門戶。一九五五年八月，與美國開始談判，在初期曾就若干具體問題達成協議，但同黑魯曉夫鬧翻以後，又改變對華盛頓的談判立場，堅持先解決原則問題，後解決具體問題，聲言不願再在具體和枝節問題上浪費時間¹⁴，將對美國的政策又由彈性轉為僵硬。

與莫斯科翻臉以後，毛澤東打算另覓出路。嗣後幾年，他在同蘇共的激烈論戰中，提出自己的戰略主張，強調暴力革命，只有槍桿子才能改造整個世界，反對「和平過渡」¹⁵；又強調和平共處只是處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係的策略，在國與國關係上講和平共處，在人民與人民關係上則講革命，二者併行不悖，不能以和平共處妨礙或代替人民革命¹⁶。他重提由共產國際策定的戰略計劃，分東西兩翼向資本主義世界進軍，但強調要避實擊虛，把主攻面放在東方的一翼，先佔領資本主義世界的這個後方，將東方世界豐富的人力與物力資源據為己有，由東方的革命引發西方的革命¹⁷。毛依據這些主張，制定他的世界革命戰略，即是由林彪提出的以世界農村包圍並奪取世界城市¹⁸。美國仍是主要敵人，但蘇聯已被排出革命陣營。他繼而決定以北平取代莫斯科，作為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¹⁹。接着又將蘇聯打成為「社會帝國主義」²⁰，與「美帝」同列為兩大敵人，與兩強同時為敵。如中共所說，在這段時期，它是以國際主義為「對外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²¹，寄希望於世界革命。毛澤東想效法十月革命開創新局面的列寧，用輸

註¹³ 一九五九年十月，中共重提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共黨革命應走毛澤東道路。參閱劉少奇：「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¹⁴ 一九六〇年九月八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中美會談一百次」，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聲明——一九六〇年九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註¹⁵ 中共強調「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改造」，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經由議會道路奪取政權的「和平過渡」，「完全是不可可能的，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談」。引自「無產階級革命和黑魯曉夫修正主義」，即「八評」——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¹⁶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即六評——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¹⁷ 「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即四評——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¹⁸ 林彪：「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北平紅旗雜誌一九六五年第十期。

註¹⁹ 毛澤東：「中國要成為世界革命的兵工廠」——毛澤東思想萬歲，六八一頁。

註²⁰ 周恩來在羅馬尼亞駐北平使館招待會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²¹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出暴力革命打出個屬於中共的紅天下，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推進到毛澤東時代。

在這一新戰略形成期間，中共已加強對亞洲、非洲兩個主要目標地區的活動。一九六一至六五年，向八個亞非國家提供六億一千六百萬美元的援助。在亞洲，籌建北平——雅加達——平壤——金邊軸心，在印尼退出聯合國後，並慫恿蘇卡諾，另組革命的聯合國。六三年底至六四年初，周恩來並親自出動，向亞非國家兜售友誼。但到了第二年，周恩來再度訪問非洲，兜售友誼就變為鼓吹革命。六五年九月，印尼共黨政變失敗，雅加達與北平乃反目成仇。六六至六八年，毛澤東發動「造反外交」，在北平及很多城市掀起排外狂潮，並向若干國家輸出紅衛兵暴亂，同將近三十個國家發生糾紛和衝突，非洲有五個國家與中共斷絕或中止外交關係，肯亞也驅逐中共代辦，使外交關係陷於停頓。這幾年的革命與造反外交，造成北平在國際社會的自我孤立。更嚴重的是：毛澤東六五年初估計，越戰再打一兩年，就會因美國知難而退，或是被趕下海去，而勝利結束。惟情勢變化與毛的估計恰恰相反，美國非僅沒有撤退或被趕走，反出兵參戰。美國在越南及東南亞集結重兵，中共在南面感受威脅；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珍寶島事件，又使北平與莫斯科的衝突升高至軍事對峙狀態，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也不斷加重，中共乃陷入兩面受敵的戰略困境。

二

孤立與腹背受敵的困境，使毛澤東從革命狂熱中冷靜下來，轉而謀求自保。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會確定「三反」（反美、反蘇、反各國反動派）為世界革命戰略的長程目標，但策略方面強調和平共處及統一戰線，比單講革命造反已較有彈性。珍寶島事件後召開的「九大」，反蘇的氣氛特別強烈，對蘇聯的攻擊竟超過攻擊美國。據周恩來透露，蘇聯曾以核子攻擊威脅中共^②，他還形容莫斯科加諸的壓力，是個「沉重的包袱」^③。北平當時的主要課題，就是設法卸下或減輕這個包袱。毛澤東最初打算直接同莫斯科經由談判來解決，但撤退邊境駐軍的建議，遭受蘇聯拒絕，軍事壓力反益形加重。正當這個時候，尼克森致力向北平搭橋，毛澤東乃將計就計，轉而跟華盛頓打交道。從而使中共得以解除南面的軍事威脅，緩和北面的軍事威脅，並借助由低溫激起的尼克森旋風，重返國際社會。

北平解釋其軟化對美國的政策，在美蘇兩個主要敵人間「先捨一取一」，是「爲了生存」^④。然而，這種政策轉變不僅是基於防禦的需要，而且一開始就含有攻擊意圖，中共拿延安時代與國民政府的和談，來說明同尼克森的低溫，只是鬥爭方法的變換，使

註② Lewis S. Feuer, 「冷戰真正結束了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美國新領袖周刊。

註③ 周恩來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同南斯拉夫信使報記者的談話——中共內部文件：「周總理對外國報界人士的談話」。

註④ 「中共對外聯絡部長耿飭就對美關係之講話（摘要）」——匪情月報第十九卷第七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〇六頁。

用「革命的兩面政策」，打破美國「反革命的兩面政策」^②。在進入聯合國後，周恩來吐露北平的行動計劃，是利用美國同蘇聯、日本、西歐的矛盾，從中取利，同時聚合第三世界的中小國家，組成新的世界權力，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而主要是反對美國^③。一九七三年三月，「昆明文件」提出在防禦方面側重反蘇，攻擊方面側重反美。同政策轉變初期相較，革命的比重較前增加，但安全的考慮仍佔優先地位。而基於安全的需要，中共並改變對西歐、日本的政策，將主要打擊目標由美國轉向蘇聯。

這些改變，只是策略性改變，並未涉及到戰略。戰略改變是從「十大」開始，到一九七四年中期才大致定型。這個新戰略是由毛澤東設計，但在毛生前，從未指明這是戰略轉變。毛死後，中共新領導把它繼承下來，加以闡釋，並說明這種轉變是屬於戰略轉變^④。

「十大」結束後，中共搬出動態權力觀^⑤，解說同「殖民主義霸權」的鬥爭，還需要經過一個力量轉化的過程，使革命力量逐漸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反革命力量逐漸由大變小，由強變弱^⑥。毛澤東死後，北平新當權派把他兩篇有關力量轉化的短文，收集在「毛選」第五卷^⑦，接着又將毛的另一篇短文公開披露^⑧。在此期間，中共並兩度為文闡述這一理論，明白指出以美、蘇為競爭對象，使這兩個真老虎，向紙老虎轉化，復指出推動敵消我長力量轉化的重要條件是鬥爭，北平的任務，就是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努力創造條件，做好這個轉化工作^⑨。這是把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所提經由退却、相持兩個力量轉化階段，然後進入反攻的持久戰略略理論^⑩，應用於當代世界，認定中共當前處境，不是可以造反的反攻階段，而是仍居劣勢的相持階段。在抗戰時期，中共會利用國軍與日軍長期對峙局面，在劣勢狀態下謀取自保，並逐漸發展壯大，促進與國民政府力量對比的有利轉化。在革命造反外交失敗後，毛澤東將之用於對外，希望能產生同樣效用。

毛澤東根據力量轉化論策定的新戰略，是個持久性戰略，其目標是從兩方面扭轉中共在世界權力結構中的劣勢地位，進而實現

註② 「從重慶談判談起」——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五日香港文匯報，「團結人民戰勝敵人的強大武器」——「學習論政策」——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一年第七期。

註③ 周恩來同英國記者 N. G. Maxwell 的談話，同②「周總理對外國報界人士的談話」。

註④ 華國鋒在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⑤ 參閱 Michel Oksenberg·「中共的戰略」——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七一年十月號。

註⑥ 「霸權主義決定了世界歷史的命運」——北平紅旗雜誌一九七三年第十期。

註⑦ 這兩篇短文是：「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註⑧ 毛澤東：「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⑨ 「新沙皇採取攻勢就埋伏着失敗」——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偉大的戰略思想」——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⑩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選第二卷。

「三反」³⁴。這兩個目標是：(一)加速經濟與國防建設，在本世紀內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³⁵；(二)因應國際政治多元化的變化，推動世界力量的有利轉化。這已為促成力量轉化定下時間表。中共還不具備必要的經濟與政治條件，在只剩下二十三年時間內，達成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更談不上在經濟與軍事戰力方面趕上美、蘇兩個強敵。不過，中共不諱言加速現代化建設是着眼於備戰，致力改進及加強常規武器和導彈核武器³⁶，並研究製造中子彈³⁷，又重提建設六個經濟協作區³⁸，使具有各自為戰的能力。設若能建立一支對美、蘇產生反嚇阻作用的核武力，以及一支相當現代化的傳統武力，而經濟協作區及內地工業建設也能有成³⁹，則中共就可以突破美、蘇的核嚇阻，以其優勢的傳統武力為後盾，大膽輸出革命⁴⁰，因而對之也不能過於低估。

一九七四年二月，基於上述相持階段戰略任務的需要，毛澤東創立一個新的戰略與策略理論，兩個月後，由鄧小平在聯大正式提出，這就是「三個世界論」⁴¹。毛死後，北平新領導仍奉行不渝，並在應付阿爾巴尼亞共黨的攻擊中加以詮釋⁴²。這一理論捨棄共黨傳統的分類標準，將兩個陣營的界限打亂，重新按照貧富、大小、強弱的標準，劃分世界權力。把美國和蘇聯歸屬於第一世界，作為主要敵人；把由所有開發中國家（中共也包括在內）組成的第三世界，放在第一世界的對立面，作為反對美、蘇兩霸的主力軍；又把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已開發國家，包括西歐、日本、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及東歐共產國家，劃為第二世界，這是可以爭取的間接後備力量。這一理論又在美、蘇之間設置另一對立面，強調要利用兩霸間的矛盾，區分主次，各個擊破，不能等量齊觀。

註① 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及「十一大」（一九七七年八月）修改後的新黨章，仍將「三反」列為基本目標。

註② 周恩來在中共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③ 「向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北平解放軍報社論。

註④ 「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對世界形勢的分析報告」——匪情月報第二十卷第五期，八〇頁。

註⑤ 余秋里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七七年五月五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⑥ 葉劍英一九七七年五月九日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講話，曾強調加快內地工業建設，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大事」，使平時能為加強戰備多出力，戰時能成為強大的戰略後方基地——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二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⑦ 對中共軍事力量的估計，請參閱：H. W. Melan「中共的人民解放軍」——美國當代歷史月刊一九七七年九月號。

註⑧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北平新華社記者綜述：「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提出後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文透露，三個世界論是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同一位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談話時提出，經周恩來闡述，由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就此作發言，鄧發言見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⑨ 毛死後中共闡釋三個世界論的文章很多，最重要者為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編輯部所撰四萬字長文：「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現階段則應以蘇聯為首要打擊目標，要「穩住西方，連橫抗俄」^④。

這是在世界範圍內對敵我友關係的重新劃分。中共記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個陣營的戰略規定，「想一下子把資本主義都打垮，結果把敵人逼在一塊」的失敗教訓^④，將資本主義世界分割為今天的敵人（第一世界）和明天的敵人（第二世界），再將兩個今天的敵人分割主要敵人（蘇聯）和次要敵人（美國），以聯合多數，反對少數，把主要敵人驅逐到最狹窄的陣地。這裏所分割的都是敵人，中共非僅未受到絲毫損害，反可以將一部份敵人的力量引為己用。北平選擇蘇聯為主要敵人，實行「穩住西方，連橫抗俄」，也含有攻擊與防禦的雙重意圖。在防禦方面，北平的安全仍然遭受莫斯科的威脅，還要借助華盛頓的力量加以緩和；而要實現力量轉化的第一個目標，使中共成為另一個共產強權，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必要的經濟與技術援助，克里姆林宮毀約斷援的慘痛教訓記憶猶新，它不會再自討苦吃，因而只有求助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攻擊方面，「穩住西方，連橫抗俄」的用意，是聯合美國、西歐與日本，同蘇聯爭鬥，使這四個世界權力（主要是美、蘇兩個巨強）在長期纏鬥中消耗力量，由強變弱，而中共則利用這種「連橫抗俄」所造成的天下大亂局面，向第三世界這個真空地帶謀求擴張，並聚合第三世界國家，結成第五個世界權力，從另一戰場打擊美、蘇兩霸。北平說在這一戰場是打「外圍戰」^⑤，而且也將反蘇旗號放在反美之上。不過，中共將外圍戰的戰場限制在非共的第三世界，在非共的第三世界，多的是美國外圍據點，很少有蘇聯的外圍據點，在這種地方打反蘇外圍戰，雖然也能對莫斯科的擴張起一定程度的牽制與破壞作用，但主要受害人仍是這些非共國家，還有華盛頓。「連橫抗俄」在這一方面，也含有聲東擊西的用意。

同六十年代的戰略作一比較，新戰略依然以世界農村（第三世界）為主要目標地區，走由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老路。不同的是：六十年代戰略類似江西時代的戰略，是個直線進攻的戰略，以革命為主要目標，暴力為達成革命目標的唯一手段；新戰略類似延安時代戰略，是個攻防並重的迂迴戰略，兼顧自保與革命雙重需要，以政治退却，有時也以政治進攻，剝奪強敵「具有威脅性的抉擇自由」^⑥，維持劣勢狀態下的戰略相持局面，利用這種權力均勢維護安全，爭取休養生息的機會，推動敵消我長的力量轉化。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戰略轉變，與從江西時代到延安時代的戰略轉變極相類似。在延安時代，即從一九三七至四九年這個階段，中共戰略演變的基本趨向，是由全面和平（政治退却），局部進攻，使鬥爭（戰爭）局部化；變至政治與軍事的全面進攻，使和平局部化（招降）。在目前時期，以全面政治退却謀取自保的近程目標大致已經達到，但並不十分牢靠，促成力量轉化的長程目

註④ 喬冠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在天津對該市及河北省重要幹部的秘密講話——臺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料室。

註⑤ 同④。

註⑥ 同④。

註⑦ 同④。

標，更是在起步階段。當前戰略態勢，與抗戰初期剛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時候大致相同。

三

中共執行這一新戰略的策略，同延安時代一樣，也是使用統一戰線。它計劃以北平為支柱，與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聯盟為基礎，聯合第二世界的國家和人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這個國際統一戰線的政治綱領，主要是反對霸權主義，爭取及維護民族獨立^{④⑦}，攻擊目標是美、蘇兩個超級強國，而主要是蘇聯。中共新領導不久以前又提出反戰作為反霸的行動口號，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以加緊反對綏靖主義政策，加強反霸鬥爭，來推遲戰爭爆發的時間。它所提「打亂兩霸戰爭部署」的五項要領，實際是要從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削弱及割斷兩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繫，在國際社會孤立莫斯科與華盛頓^{④⑧}。北平還認為，美、蘇大戰無法避免，戰爭一旦爆發，世局將有許多為兩強難以預料與控制的變化，有組織革命的廣泛機會，利用反戰運動儲蓄力量，也是為戰爭來臨後掀起革命，使「多少億人口轉到社會主義」準備條件^{④⑨}。

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策略的實際運用，因對象不同也有差別。對美國，現在用的是類似抗戰初期對國民政府的統戰手法，即全面聯合，使鬥爭局部化。為了全面聯合，北平把同華盛頓的原則爭端，能夠凍結的都暫時凍結起來，不能凍結的（如所謂「臺灣問題」）則拖延下去，同時採取迂迴方法，從其他途徑製造有利形勢，誘迫美國作原則性退讓。中共還在「上海公報」中承諾不以武力威脅解決國際爭端，不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這些承諾，使人以為它已改變立場，以前把它視作擴張主義，現在應加重估^{⑤①}。但在這些承諾提出八個月以後，北平又將戰爭區分為「正義的」、「非正義的」兩類，聲言一貫支持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不以武力、武力威脅解決國際爭端，正義戰爭並不包涵在內^{⑤②}；它還應用這個戰爭邏輯，把它支援北越南侵和東南亞國家共黨叛亂，說成是支援「正義鬥爭」，並非謀奪霸權，從而將自己由這些承諾的約束中解脫出來。這與一九三七年中共以實行三民主義等保證，換得國民政府再度容共，隨後又分割三民主義為真、假兩類，表明所保證實行的只是對它有利的「真」三民主義，不包括它無利可

註④⑦ 中共認為許多歐洲國家也面臨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第二世界國家的無產階級，除了進行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鬥爭，也要打起民族獨立的旗幟，領導或參加反對蘇、美兩霸的鬥爭。同④②。

註④⑧ 五項要領是：「不許它們（蘇美）侵犯本國和別國的主權，不許它們佔領本國和別國的領土領海、戰略要地和戰略通道，不許它們用武力、武力威脅或其他方法干涉本國和別國的內政，嚴密防範它們的顛覆陰謀和利用『援助』來帶軍事、政治、經濟詭計，不許它們在任何地方建立、劃分、爭奪勢力範圍。」同④②。

註④⑨ 同④⑧，此語引自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選第五卷，三九八頁。

註⑤① 如 Richard H. Solomon·「透視中共問題」(Thinking Through The China Problem)——美國外交季刊一九七七年冬季號。
註⑤② 喬冠華在二十七屆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北平人民日報。

圖的「假」三民主義^②，同樣是以空泛的、無意兌現的政治諾言，與對方「求同」，換取對方實質讓步的權宜之計。

北平新領導也在用這種手法勾引美國。鄧小平曾表示，歡迎美國也參加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夥同第三世界、第二世界一齊努力，摧毀蘇聯的全球戰爭計劃。反霸好像只剩下反蘇，而不再反美。抗戰初期，中共也曾以抗日急先鋒姿態，謀取國民政府的容讓與實質利益，它當時所作表白，如「誠心誠意擁護國民政府」，「尊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比鄧小平如今向山姆大叔的表態更來得動人。但究其實際，仍然將國民政府及國民黨當作次要敵人，千方百計積蓄力量，準備奪取政權，並從未停止反政府宣傳。北平目前對美國的策略，也是由這種既聯合、又鬥爭的矛盾的兩面所構成，不能只重視聯合的一面，忽略鬥爭的一面。從鬥爭的一面觀察，北平從不隱諱以美國為次要敵人，也從未停止反美的宣傳和行動。跟延安時代不同的是：抗戰開始以後，中共已經獲得保障安全、擴展實力的有利環境，現在的兩個強敵却在進行和解，因之，反美的言論及行動格外謹慎，以免將華盛頓逼到敵對的一邊，並視美蘇和解為應加關切的「頭等大事」，力謀阻撓及破壞^③。

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北平最先亦在與安全有直接關連的東南亞、日本、西歐等問題上同華盛頓講聯合，希望山姆大叔替它擋住北極熊；隨後又將聯合面擴大至與安全無關的其它問題方面，與華盛頓攜手反對莫斯科，在安哥拉、中共與美國支持同一派系對付蘇聯，但當戰火愈燒愈烈後又撤去援助，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白宮，還在一邊推波助瀾，強調安哥拉戰略地位的重要，不能讓蘇聯得逞，它事後又責備美國只放空砲，沒有真正使用力量，阻止莫斯科的侵略。它並例舉一些美國應該強硬反而緩和、不該插手反而插手的國際問題，都着眼於挑起華盛頓與莫斯科的衝突^④。這已表明北平聯美的策略意圖，是讓美國充當反蘇的國際憲兵，使兩個強敵永遠保持緊張的對抗狀態，最好是由冷戰變成熱戰。果能如此，就可以為邁向新戰略防禦和攻擊的目標，創造個有利環境。

莫斯科在北平新策略中所佔地位，類似抗戰時期的日本。不過，蘇聯加諸中共的威脅遠較當年日本為大，更加要小心對待。是以北平新領導雖在修改後的黨章及憲法中，將反蘇改放在反美的前面，反蘇的聲浪也比過去激烈，但其實際行動，仍極謹慎而有節制：軍事上採取守勢，外交上的攻擊，在與安全有重大關連地區，如日本、西歐及東南亞，着重攻勢防禦，破壞莫斯科的包圍封鎖及西守東攻計劃，以求自保；在第三世界則是以外外交游擊戰困擾蘇聯，遇到與對方有直接衝突危險時馬上撤退，如安哥拉。中共並

註②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選第二卷，六八一——六八七頁。

註③ 同②。

註④ 同③八四頁。黃華所舉美國應強硬反搞緩和的國際問題，除安哥拉問題外，還有歐洲、印度洋、印巴戰爭等問題；美國不應插手反而插手的國際問題，為中東及韓國問題。

將反蘇外交戰的主戰場限制在非共世界，對克里姆林宮視同禁臠的東歐，連宣傳抨擊也只是偶而爲之，毛澤東死後，北平新當權派更將東歐國家劃入還在革命準備階段的第二世界，又聲言不擬另建新共產陣營，與莫斯科抗衡^⑤。即連對外蒙駐紮蘇聯重兵、越南倒向莫斯科，這些與其安全休戚相關的問題，也不敢作任何強烈反應。在雙邊關係方面，中共的策略是把黨和「國家」分開，繼續黨際鬥爭，同時保持及改善「國家關係」，但一直堅持從邊境爭議地區撤軍，作爲恢復正常「國家關係」的先決條件^⑥，即希望經由談判，緩和蘇聯的軍事壓力。

毛澤東早就爲對蘇聯政策定下基調，就是要「準備兩手，準備破裂，爭取拖」^⑦，「要文鬥不要武鬥」^⑧。中共現在的決策仍舊依循這些原則，企圖使不戰不和的局面能夠持續下去，贏取力量轉化的時間。

中共視西歐與日本一如抗戰時期的第三勢力，但這兩個第三勢力，遠較抗戰時期的第三勢力強大，對中共的安全也甚具重要性。北平宣稱第二世界的革命尚在準備階段，即是將西歐、日本等降級爲明天的敵人，是今天的夥伴，並利用反霸、貿易爲媒介，極力向西歐、日本拉關係。中共已與歐市簽訂爲期五年非優惠性貿易協定，與日本簽訂總額達二百億美元的八年貿易協定，同這兩方面的關係都已獲得重大進展。北平加緊勾搭這兩個世界權力，除爲了大量引進科學技術與工業設備，以加速推行「四個現代化」，還含有政治意圖。中共公開表示，想拉西歐參加反霸統一戰線，要西歐摒棄對蘇聯的姑息與苟安心理，用對抗來代替對話，與北極熊周旋^⑨。這樣就可以把蘇聯困在西線，跟西歐及美國去爭鬥，而不得不減輕對中共的威脅。北平在西歐打出的反霸旗號是「維護獨立主權，保衛民族生存」，除了針對莫斯科，也提到西歐同美國也存在「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⑩，並沒有完全撇開華盛頓。對日本，簽訂貿易協定的政治目的，是爲締結和平友好條約鋪道。締結有反霸條款的和約，即是與日本結爲反蘇夥伴，而當情勢變化，反霸條款也可以用來對付美國。一年以前，廖承志曾告訴日本總評主席木加真枝說：中共要反的帝國主義及霸權國家，是將美國與蘇聯一齊包含在內，而非單指其中任何一個。其次，白宮以三邊主義爲對外政策的基礎，日本與西歐是三邊中的兩邊，拉住這兩邊，就有可能影響另外一邊，從美國那裏討點便宜。

中共以第三世界爲抗戰時期的敵後農村地區，也是攻勢戰略的主要目標地區，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策略在這一地區的運用爲：

註⑤ 同②。

註⑥ 中共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致蘇聯照會——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北平新華社電：「不要空頭聲明，要實際行動」——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北平人民日報評論。

註⑦ 毛澤東：「在一個反修報告會上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九月四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五七八頁。

註⑧ 同⑦六九頁，黃華透露這是毛澤東一九七〇年對蘇聯邊界問題談判代表團團長依利契夫所說的話。

註⑨ 「西歐聯合反霸是歷史的需要」——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北平人民日報評論。

註⑩ 同⑨。

(一)把自己裝扮成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忠實同志和堅定支持者，利用民族主義這個有力媒介，擴展影響力，逐漸成爲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二)拓展國家關係與策進民族解放運動平行發展，在實施初期，將拓展國家關係放在優先位置。

(三)在組織方面，不強求統一，着重影響各種地區性國家集團，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在行動上互相策應，發揮聯合作戰的功效。

(四)從迎合第三世界多數國家的需要與願望、響應並支持其自發行動着手，建立影響力，在適當時機注入新內容，煽動及助長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將之導入反霸的軌道。

(五)在第三世界各個地區，靈活使用經濟、政治、軍事三種鬥爭形式，能源危機發生後，更將經濟鬥爭置於首要地位。北平透露使用石油這個「黑色東西」作爲政治武器鬥帝國主義，乃毛澤東所建議^①，這也許過份誇張，不過，中共確實想抓住開發國家在石油及其他原料供應方面，依賴第三世界這個弱點，煽風點火^②，燒西方世界這條生命線。中共還利用維護經濟獨立、保衛民族資源、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等口號，煽動第三世界起而反對超級大國的「剝削和掠奪」，企圖挑起窮國與富國的對立和衝突。政治鬥爭的策略是助長第三世界的中立化趨向，支持印度洋、地中海、紅海、東南亞、南亞及拉丁美洲國家建立和平區、安全區和無核區的主張，支持不結盟運動^③，並解釋中立化要「擺脫外來干涉和控制」^④，要「前門驅狼（美國）、後門拒虎（蘇聯）」^⑤。捍衛民族獨立與國家主權，將中立化引向反霸。軍事鬥爭目前還在準備階段，北平的作法是經由政治與經濟鬥爭普遍播種，待機作重點突破，同時繼續支援已有的武裝活動。受北越得手後倒向莫斯科的教訓，據黃華透露，決不再支持修正主義，但他駁斥溫和平上臺後，北平將減少支援各地共黨武裝叛亂之說，強調將以更大精力支持人民革命運動，開創新局面。他還透露，處於困難情況的泰國、馬來西亞亞共黨，最近已聽從中共的指示改變戰術，以靈活的游擊戰「拖住」敵人，以擴大宣傳爭取羣衆，積蓄有生力量，並供應其必要的軍事裝備及其他物資，對緬共白旗派與菲律賓新人民軍，也決定續加支持^⑥。東南亞國家的共黨叛亂仍在初期階段，在可預見

註① 同⑦七八頁，黃華透露這是毛澤東向某一阿拉伯國家領袖所提出。

註② 鄧小平曾說：「石油鬥爭打開了人們的眼界，石油鬥爭可以辦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問題上也可以辦到。」——同④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真理是抹殺不了的」也說：「第三世界國家手裏有強大的原料武器，可以用之進行強有力的鬥爭，以有效地對付超級大國」。

註③ 黃華在聯大第三十二屆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④ 周恩來在歡迎馬來西亞總理拉薩克宴會上講話——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北平人民日報。

註⑤ 同⑥及「非洲——第三世界聯合反霸的一支重要力量」——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北平新華社記者述評。

註⑥ 同⑦八五、八六頁。

的將來難望奪得政權⁶⁷，惟持續不斷與日漸增大的顛覆威脅，已迫使這些國家不得不撥出巨款購買武器，加以應付⁶⁸。

四

綜上所述，中共現行世界戰略與策略，是建築在「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的共同基礎之上。在五十年至六十年代，北平對外決策的主要難題，是無法使這兩方面的需要，能以統籌兼顧。毛澤東因應國際政治多元化的變化，把早年持久叛亂的戰略與策略，用於今日世界，想解決這個困難問題。到目前為止，新戰略屬於防衛性質的短程目標，或已實現，或已獲得相當進展，並已為邁向長程目標贏得時間及外來援助。但是，中共缺乏實力，也缺乏像抗戰時期那樣可供有效運用借力策略的環境，因而在與安全攸關的對美國、日本、西歐、東南亞政策方面，都顯露在「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之間還存在不易克服的矛盾，事實上很難兼顧。

中共雖已擺脫兩面受敵的戰略困境，但北方的軍事威脅只是緩和，並未解除，越南親蘇後表露的敵對態度，使南方的安全也出現問題。尤以在和解試探遭拒絕後，布里茲涅夫親自巡視蘇聯遠東地區，接着由捷克、保加利亞出面，警告中共不得威脅外蒙安全⁶⁹。顯示莫斯科又加重對北平的壓力。其次，「連橫抗俄」也使北平在共產世界的處境日益孤立。中共想借助狄托拉攏歐洲共黨，結果更加激怒霍查，使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原已退化的關係益形惡化⁷⁰，北平事實上已失掉這個東歐的唯一支持者。

北平與華盛頓為反蘇而接近，可是，雙方在這唯一共同點上也存在難以協調的分歧。美國想利用中共制衡蘇聯，維持權力均勢與世界現狀，以建造和平架構。北平在防衛方面也玩弄均勢外交，借華盛頓之力牽制莫斯科，但中共視均勢為相持階段的過渡現象，並以改造世界現狀為己任，故其攻勢戰略目標，是破壞權力均勢，而不是維持權力均勢，是推翻世界現狀，而不是維持世界現狀。因之，要阻撓美蘇和解，挑撥並助長兩強的衝突。西歐的情況亦復如此。西歐也是想利用中共作平衡的籌碼，保持歐洲的安定；北平則想把蘇聯這股禍水引回西線，以減輕其對自己的壓力，並在西線製造危機，雙方反蘇也各有打算。美國和西歐不會改變和解政策，中共也沒有力量促使其改變，它也許能在其他方面（如技術援助）得到某種程度補償，但很難得到如抗戰時期從容坐大的機會。

註⁶⁷ Shee Poon-Kim：「東南亞國協成立十年：一九六七——一九七七」——美國加州大學亞洲綜覽月刊，一九七七年八月號。

註⁶⁸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時報George McArthur新加坡報導。

註⁶⁹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莫斯科電台華語新聞廣播。

註⁷⁰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四日香港虎報Michael Tockley貝爾格萊德報導。

對東京，北平堅持在和約中列入反霸條款，不僅爲了反蘇，也是爲了反美。深一層觀察，中共正致力培植日本「人民的力量」，反霸同盟加上「人民的力量」，中共即可以其人力與資源結合日本的工業力量，建立亞洲與世界霸權。日本則希望維持同北平與莫斯科的等距離關係，更希望保持與美國的聯盟，以及亞洲特別是東北亞的和平秩序，雙方的戰略利益也根本分歧。因之，縱使東京經受不住中共的威脅利誘，也不理會蘇聯要採取報復行動的警告，使和約得以簽訂，也將盡可能設法持續其對兩個強鄰的等距離政策，不會接受反蘇同盟，更不用說反美聯盟。中共改造日本的計劃，不僅仍將受到日本的抵制，而且會引起美國與蘇聯的關注，還存在很多不易突破的難關。

在第三世界，中共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一)第三世界國家歷史背景、現實利害多不相同，難以形成統一的力量。(二)北平的計劃着眼於廣泛發動羣衆性民族民主運動，從而建立、壯大左翼及共黨勢力，並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削弱甚至切斷第三世界國家與開發國家的聯繫，以製造打「外圍戰」的條件，這都需要當地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的支持，而目前是溫和民族主義勢力抬頭，激進派失勢，中共的偏激主張無法引起廣泛共鳴，暴風雨式的羣衆運動也發動不起來。(三)第三世界並非如北平所想像的是個真空地帶，在它面前還有美、蘇等強有力的對手，而中共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只能以有限財力作重點運用，缺少與強敵競爭的實力。

然而，對中共新戰略的實用價值，也不宜過於低估。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扶中共、抑蘇聯的均勢制衡政策，使北平有機可乘。北平還握有民族主義這個有力的政治武器，「中共模式」對第三世界也很有吸引力，而國際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如不改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也有可能捲土重來。中共實力不足，但善於將別人力量引爲己用，今日世界也確實存在許多矛盾和疏忽，使其有可借之力。北平不諱言要建設「社會主義強國」，人們往往替它抽掉社會主義，只留下「強國」，作爲「社會主義強國」，其處理國際關係是應用列寧主義的邏輯，即同盟者只是同走半截路的人，是前半截路的朋友，後半截路的敵人，也即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敵人。設若只替它留下個「強國」，則非共世界慣用的外交邏輯，世界上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也可以適用於中共，而寄以信賴，給予援助，與之坦誠相處。中共以外交爲一種鬥爭工具，外交既是戰爭，自然有進攻，也有退却，但退却並不等於承認失敗或錯誤，不再戰鬥。而人們往往爲其戰術性退却的假象所惑，誤以爲它已憬悟前非，決心在國際社會扮演建設性的角色。北平兩面手法所產生的這些迷亂及導誤作用，使它可以不花代價或者只花費極少的代價，達成與對方的借力交易。

中共新當權派已一再聲明，仍將遵循毛澤東的外交路線，不擬變更，這話可以採信。但是，北平高階層的權力衝突還沒有完全塵埃落定，領導人的變換，也有可能導致策略或戰略的更改。而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社會，運用這種詭詐而極具彈性的兩面戰略，需

註⑦ 同⑥及昆明文件第四十三號。

要掌舵者具有絕對權威、謀略修養及靈巧的手腕，失掉毛澤東、周恩來以後，無論是華國鋒、鄧小平或葉劍英，都不具備這些條件，且在處理若干問題上，已有偏差和錯誤，而嚴重的偏差和錯誤，也有可能引起策略乃至戰略的改變。

莫斯科、北平與第三世界：影響力的爭奪

※ 史塔爾

蘇聯及中共對第三世界的看法，在實質上相異，它們各自的經驗，亦不相同，而且可能由於彼此間的競爭，它們的成就甚至於只是短暫的。雖然我們知道到目前為止莫斯科及北平對第三世界人民「爭取民心」的紀錄，比具有較長經驗的西方只可能更差，但目前要對這個問題作出任何定論似乎仍嫌過早。

相異的看法

列寧稱殖民地為帝國主義「最弱的一環」，但他的政府未能利用這種弱點。史達林幾乎毫無作為。一直到赫魯雪夫才開始利用第三世界較落後國家中的所謂民族解放運動^①。這種新的力量的相互關係（蘇聯集團加上較落後國家）將使得權力的平衡自資本主義移向「社會主義」。布里茲涅夫沿用了赫魯雪夫的思想而將其應用於擺弄出全球性強權的形象，希望藉此削弱美國以及中共的全球性強權的影像。

北平的看法與莫斯科的不同，而且是根據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②，其中兩個超級霸權國家構成第一世界；澳紐地區、加拿大、歐洲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構成第二世界；而其餘在亞、非、拉丁美洲的較落後國家（包括中共本身）則構成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與第二世界的聯合已告失敗，據稱是由於第二世界國家中與「帝國主義」的反動交往。華國鋒曾在其對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中共

※ 史塔爾原名Richard F. Starr，美國胡佛研究所副所長。

註① 「莫斯科電台」（一九七八年元月十二日）宣佈蘇聯與六十個較落後國家訂有協定，而且已經完成正在建造大約一千項計劃，其中四分之三均為工業計劃。

註② G. Ntikolayev, 「世界的劃分：北京式」，消息報（一九七八年元月二十一日），第五頁；莫斯科。亦見毛主席區分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重要貢獻（北平：外語出版社，一九七七）。